

中国文学编年史

宋辽金卷
(下)

主编◇陈文新

本卷主编◇张玉璞

湖南人民出版社

主编◇陈文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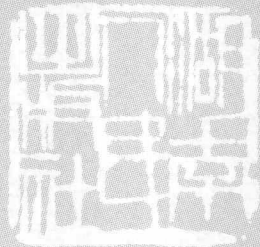
本卷主编◇张玉璞

中国文学编年史

宋
辽
金
卷

(下)

盧中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学编年史. 宋辽金卷(上、中、下)/陈文新主编; 诸葛忆兵(上)、
张思齐(中)、张玉璞(下)分册主编.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6.9
ISBN 7-5438-4532-6

I.中... II.①陈...②诸... III.①文学史—编年史—中国—宋代②文学史—编年史—中
国—辽金时代 IV.I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17665号

中国文学编年史·宋辽金卷(上、中、下)

责任编辑: 李建国 胡如虹 曹有鹏

张志红 邓胜文 杨 纯 聂双武

主 编: 陈文新

书名题字: 卢中南

装帧设计: 陈 新

出 版: 湖南人民出版社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市场营销: 0731-2226732

网 址: <http://www.hnppp.com>

邮 编: 410005

制 作: 湖南潇湘出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电 话: 0731-2229693 2229692

印 刷: 中华商务联合印刷(广东)有限公司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版 次: 2006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1094 1/16

印 张: 99.5

字 数: 2,193,000

书 号: ISBN 7-5438-4532-6/I·449

定 价: 740.00元(上、中、下册)

《中国文学编年史》编纂委员会

顾问 (按姓氏笔画排序)

卞孝萱 邓绍基 冯其庸 曹道衡 傅璇琮
霍松林

主编 陈文新

编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石观海 李建国 汪春泓 陈文新 张思齐
张玉璞 於可训 赵伯陶 赵逵夫 胡如虹
诸葛忆兵 曹有鹏 熊治祁 熊礼汇 霍有明

本卷撰稿人

张玉璞

总序

纪传体、编年体是中国传统史书的两种主要体裁，而编年体的写作远较纪传体薄弱。《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七史部编年类小序已明确指出这一事实：“司马迁改编年为纪传，荀悦又改纪传为编年。刘知幾深通史法，而《史通》分叙六家，统归二体，则编年、纪传均正史也。其不列为正史者，以班、马旧裁，历朝继作。编年一体，则或有或无，不能使时代相续。故姑置焉，无他义也。”^①与古代历史著作的这种体裁格局相似，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写作中，也是纪传体一枝独秀，不仅在数量上已多到难以屈指，各大专院校所用的教材也通常是纪传体，这类著作的核心部分是作家传记（包括作家的创作经历和创作成就）。编年类的著作，则虽有陆侃如、傅璇琮、曹道衡、刘跃进等学者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但就总体而言，仍有大量空白，尤其是宋、元、明、清、现、当代部分，历时一千余年，文献浩繁，而相关成果甚少。这样一种状况，自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这套十八卷的《中国文学编年史》的编纂出版，即旨在一定程度地改变这种状况。

文字又不通如 延安风骨、盘眉飞家、人历时风 等,就是这种字不省意的疑

1

结。但是，由于风会之说仅能言其大概，“个别”和“例外”（即使是非常重要的“个别”和“例外”）往往被忽略，不免留下遗憾。一些跨时代的作家，如李煜、刘基、张岱等人，在文学史中的时代归属与其代表作的实际创作年代也常有不吻合的情形。例如，李煜被视为南唐作家，而他最好的词写在宋初；刘基被视为明代作家，而他最好的诗、文写在元末；张岱被视为明代作家，而其代表作多写于清初。比上述情形更具普遍性的，还有下述事实：我们讲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往往以毛宗岗修订本为例；我们讲施耐庵的《水浒传》，往往以百回繁本为例；我们讲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往往以崇祯本为例。这就出现了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我们讲的并不是作家的原著；第二，我们忽略了读者的接受情形。这类涉及风会与例外、作家时代归属与作品实际创作、传播与接受两方面的问题，以纪传体来解决，由于受到体例的限制，往往力不从心，采用编年体，解决起来就方便多了：不难依次排列，以展开具体而丰富多彩的历史流程。

与纪传体相比，编年史在展现文学历程的复杂性、多元性方面获得了极大的自由，但在时代风会的描述和大局的判断上，则远不如纪传体来得明快和简洁。作为尝试，我们在体例的设计、史料的确认和选择方面采用了若干与一般编年史不同的做法，以期在充分发挥编年史长处的同时，又能尽量弥补其短处。我们的尝试主要在三个方面：其一，关于时间段的设计。编年史通常以年为基本单位，年下辖月，月下辖日。这种向下的时间序列，可以有效发挥编年史的长处。我们在采用这一时间序列的同时，另外设计了一个向上的时间序列，即：以年为基本单位，年上设阶段，阶段上设时代。这种向上的时间序列，旨在克服一般编年史的不足。具体做法是：阶段与章相对应，时代与卷相对应，分别设立引言和绪论，以重点揭示文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时代特征（现当代文学因时间周期较短，拟省略阶段，不设引言）。其二，历史人物的活动包括“言”和“行”两个方面，“行”（人物活动、生平）往往得到足够重视，“言”则通常被忽略。而我们认为，在文学史进程中，“言”的重要性可以与“行”相提并论，特殊情况下，其重要性甚至超过“行”。比如，我们考察初唐的文学，不读陈子昂的诗论，对初唐的文学史进程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了解；我们考察嘉靖年间的文学，不读唐宋派、后七子的文论，对这一时期的文学景观就不可能有准确的把握。鉴于这一事实，若干作品序跋、友朋信函等，由于透露了重要的文学流变信息，我们也酌情收入。其

三，较之政治、经济、军事史料，思想文化活动是我们更加关注的对象。中国文学进程是在中国历史的背景下展开的，与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均有显著联系，而与思想文化的联系往往更为内在，更具有全局性。考虑到这一点，我们有意加强了下述三方面材料的收录：重要文化政策；对知识阶层有显著影响的文化生活（如结社、讲学、重大文化工程的进展、相关艺术活动等）；思想文化经典的撰写、出版和评论。这样处理，目的是用编年的方式将中国文学进程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中国思想文化变迁一并展现在读者面前。

《中国文学编年史》是一个基础性的重大学术工程，文献的广泛调查和准确使用是做好编纂工作的首要前提。《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存目丛书》、《四库禁毁书丛刊》、《丛书集成》、《笔记小说大观》等是我们经常使用的典籍，近人和今人整理出版的别集、总集，大量年谱（如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以及文、史、哲方面的编年史，均在参考范围之内，限于体例，未能一一注明，谨此一并致谢。在使用上述文献的过程中，我们采取的是一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谨慎态度。这是因为，相当一部分典籍是由我们第一次标点，这一工作的难度是不言而喻的。即使是前人已经整理的典籍，我们也并不直接采用，而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再整理一次。这样做当然增加了工作量，但确有许多好处，若干错误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得到纠正的，有些错误的纠正涉及基本事实的澄清。比如，张大复《皇明昆山人物传》卷八记梁辰鱼晚年情形，有云：“（梁氏）当除夕遇大雪，既寝不寐。忽令侍者遍邀诸年少，载酒放歌，绕城一匝而后就睡。曰：‘天为我辈雨玉，可令俗人蹴踏之耶？’时年已七十矣。亡何，中恶，语不甚了。有老奴李用者，颇省其说，尚有注记。得岁七十有三。”一位学者将“中恶，语不甚了”标点为“中恶语，不甚了”，并就此推论说：“梁辰鱼七十岁时遭遇暧昧不明的事件。”“《皇明昆山人物传》的上述记载本意是为贤者讳，事实上倒很可能为统治者隐盖了迫害异己文人的一件罪行。”这就不免弄错了事实。“中恶”即突然患急病，正所谓“老健春寒秋后热”，老年人得急病是常见的情形。而“中恶语”的表述，明显不符合古人的语言习惯。再如，陈田《明诗纪事》将正德时期的傅汝舟与明末的傅汝舟混为一人，将两人的生平搅在一起，其按语云：“丁戊山人诗初矜独造，晚遁荒诞，择其入格者录之，亦是幽弦孤调。山人享大年，具异才，谈佛谈仙，亦作北里中艳语。初与郑少谷游，晚乃与茅止生、卓去病、张文寺、文太青倡和，支离怪

诞，无所不有。少谷集中无是也。论者乃专谓山人刻意学少谷，何哉？”《明诗纪事》近三百万言，卓有建树，是研究明诗的必备案头书。但关于傅汝舟，陈田的确弄错了。郑善夫（1485—1523）号少谷，以学杜著称，学郑少谷的是正德年间的傅汝舟；文翔凤号太青，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与文太青等唱和的是明末的傅汝舟。两个傅汝舟之间相距约百年，陈田想当然地将二者合为一人，说他“享大年”，又说他前期学郑少谷，后期学竟陵派，曲意弥缝，令人哑然失笑。其他种种，如部分文学家辞典对作家生卒年的误注，若干点校本的断句错误等，我们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了纠正。提到这些情况，不是想证明我们的水平有多高，而意在告诉读者：我们的工作态度是认真的，有志于为读者提供一部值得信赖的编年史著述。

《中国文学编年史》的编纂得到了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华书局、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山东曲阜师范大学、中南民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单位专家和领导，尤其是武汉大学领导的支持；湖南省新闻出版局、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及湖南人民出版社鼎力支持编年史的编纂出版，所有这些，我们将永远铭记在心。

陈文新

2006年7月23日于武汉大学

凡 例

一、《中国文学编年史》以编年形式演述中国文学发展历程，凡十八卷：第一卷周秦、第二卷汉魏、第三卷两晋南北朝、第四卷隋唐五代（上）、第五卷隋唐五代（中）、第六卷隋唐五代（下）、第七卷宋辽金（上）、第八卷宋辽金（中）、第九卷宋辽金（下）、第十卷元代、第十一卷明前期、第十二卷明中期、第十三卷明末清初、第十四卷清前中期（上）、第十五卷清前中期（下）、第十六卷晚清、第十七卷现代、第十八卷当代。

二、编年史各卷据文学发展的不同阶段划分为若干章（如无必要，或不分章）。章的标目方式是：“××章 ××年至××年，共××年”。关于某一阶段文学的总体评论放在该章的首年之前，如明前期卷“第一章 洪武元年至建文四年，共35年”，在章目下，“洪武元年”之前，单列明前期卷“引言”一目。关于某一时代文学的综合论述，放在卷首。如元代卷，在第一章前，单列元代文学“绪论”。

三、编年史各卷所收录内容的构架大体统一，重点包括七个方面：1. 重要文化政策；2. 对文学发展有显著影响的文化生活（如结社、讲学、重大文化工程的进展、相关艺术活动等）；3. 作家交往（唱和、社团活动等）；4. 作家生平事迹；5. 重要作品的创作、出版和评论；6. 争鸣（团体之间、个人之间在重要问题上的论辩等）；7. 其他。

四、叙事以纲带目，即在征引相关文献之前有一句或数句概述。如，先总叙一句“俞宪编《盛明百家诗》成书”，再征引相关序跋、著录、评议。前者为纲，后者为目，纲、目配合，旨在完整地呈现文学史事实。少量见于常用工具书的重要史实，或不必展开的文学史事实，则列纲而略目，以省篇幅。

五、公历纪年年初与中国传统纪年年末不属同一年份，如公元1899年元月1日至12月31日对应于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十一月二十七日至光绪二十五年己亥十一月二十九日，而不对应于光绪二十五年己亥正月初一至十二月三十日。我们采用变通的处理方法，以公历纪年，而以农历纪月，比如，凡光绪二十五年己亥正月至十二月之内的内容均置于公元1899年下。作家生卒年，仍据公历标注，其他以此类推。现、当代文学部分，纪年、纪月均据公历。

六、同一年内之文学史实，按月份先后顺序排列。月份不详而仅知季度的，春季置于三月之后，夏季置于六月之后，其他以此类推。季度、月份均不详者，另设“本年”目统之。

七、一部分重要文学史实，年月不详而仅知大体时段者，在年号之末另设“××年间”目统之，如嘉靖四十五年之后另设“嘉靖年间”一目。

八、引用序跋，一般采用“作者+篇名”的方式，如“臧懋循《唐诗所序》”。引用序跋之外的诗文等作品，一般采用“集名+卷次+篇名”的方式，如“《有学集》卷三一《隐湖毛君墓志铭》”，采用“作者+篇名”的方式，如“钱谦益《隐湖毛君墓志铭》”。无篇名者则省略，如“《艺苑卮言》卷三”。某作者集中所收为他人别集所作的序跋，亦采用这一方式，如“《太函集》卷二二《弇州山人四部稿序》”。引用正史，一般采用“正史名+本传或××传”的方式，“如《明史》本传”或“《明史》李攀龙传”，不标卷次。引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或用全称，或简称“四库提要”，只标明卷次。如“四库提要卷一五三”。引用地方志，标明纂修年代，如“光绪《乌程县志》卷三一”。据类书转引时，注明原出处，如“《太平广记》卷二〇《阴隐客》（出《博异志》）”。引用报刊，注明年月日或卷次。

九、作者小传一般置于生年。有些作家，虽生年在上一卷，但在上一卷无文学活动，其小传酌情移入本卷首次出现时。如杨士奇，元亡时才4岁，其小传置于明前期卷，出生时只交代：“杨士奇（1365—1444）生”，不列小传。现、当代作者，因传记资料常见，相关作家小传酌情收录。

十、对于某一作家的总体评论和重要著录一般置于卒年。某作者卒年在下一卷，但在下一卷无重要文学活动，主要评论材料酌情置于本卷。如易顺鼎（1858—1920），其评论材料集中于晚清卷，不入现代卷。

十一、作家代表作一般不录原文，但收录重要评论材料，并酌情说明相关选本收录情形。

十二、需要补充交待而占用篇幅较大的文学史事实，设少量“附录”。对若干需要辩证的史实，设按语加以说明。以提供文献线索为主，不详加征引。

绪论

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下：道学之名，起于元祐，盛于淳熙。其徒甚众，其间假以欺世者，真可嘘枯吹生。凡治财赋，则目为聚敛；开阡捍边者，则目为粗才；读书作文字，则以为玩物丧志；留心吏事者，则斥为刀笔舞文。盖所读者止《四书》、《近思录》、《通书》、《太极图》、《西铭》及诸家语录，自诡其学能正心齐家以至治国平天下。故为之说曰：“为天地主心，为生民立极，为前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凡为州县为监司，必须建立书院及道统诸贤之祠，或刊注《四书》，衍辑《近思录》等文，则可钧声誉，致通显。下而士子时文，必须引以竖义，则亦擢巍科而称名士。否则，立身如温公，文章气节如东坡，皆非本色也。于是天下竞趋之，稍有违者，其党必挤之为小人，虽时君亦不得而辨别之。其气焰可畏如此。然所言所行了不相顾，往往皆不近人情之事。是时为朝士者，必议论愤愤，头脑冬烘，弊衣菲食，出则乘破竹轿，



昇之以村夫，高巾破履，人望而知为道学君子。显达清要，旦夕可致。然其家囊金匱帛，至为市人所不为。贾师宪独持相权，唯恐有攘夺之者，则专用此辈，列之要路，名为尊崇道学，实则幸其阉茸不才，不致掣其肘。以是致万事不理，丧身亡国。呜呼！孰谓道学之祸不甚于典午之清谈哉！

又后集《太学文变》：南渡以来，乾、淳之文，师淳厚，时人谓之“乾淳体”，人材淳古，亦如其文。至端平江万里习《易》，自成一家，文体几于中复。淳祐甲辰，徐霖以《书》学魁南省，全尚性理，时竞趋之，即可以钓致科第功名。自此非《四书》、《东、西铭》、《太极图》、《通书》、《语录》不复道矣。至咸淳之末，江东李谨思、熊瑞诸人倡为变体，奇诡浮艳，精神焕发，多用《庄》《列》语，时人谓之“换字文章”，对策中有“光景不露”、“大雅不浇”等语，以至于亡，可谓文妖矣。

王士禛《带经堂诗话》卷四：南渡以后，程学盛于南，苏学盛于北。

方回《跋胡直内诗》：学周、程，文欧、苏，诗黄、陈，与治俱极，而章、蔡乱之。南渡复矣，又厄于桧。谁实洗日濯月，以有乾、淳？迄庆元大儒歿，侂十三年，远二十七年，清、嵩出入，倾轧十八年，权归宦侍，循至全、道，又几二十年，而乱极不可救矣。盖江左百五十年，前七十年仅一桧为梗也，后八十年连梗六柄臣，皆仇正嫉是，稍知书，又阳进真、魏而阴排之，下之人视偏效蔽，桎于私，痼于习，一时所尚，非万世公论。学也临川而四明，文也永嘉而东嘉，我觉子觉，诋濂喝洛，黄直卿、李敬子之守可移乎？升阍言归，肆力碑板，陈寿老、吴明辅奔其后，而卒莫计也。至于诗，唯章泉、南塘有乾、淳之风，四灵不复五矣。刘潜夫始亦染指四灵，后宗放翁，卒自名家。今之褒博，不讲学，不论文，间一见为诗，曰：“我晚唐也。”问晚唐何自入，曰：“四灵也。”然则非四灵也，乃近时书肆所刊江湖诗也。

《南宋书》卷六三《文苑传序》：宋世文章大家，归之欧、苏、曾、王，而一时振起，神、哲两朝，得人为盛。其他单启小词，翰墨丹青，亦有杰出流辈，声高艺林者。南渡而后，大约附于道学，求其为能言之士，郁然文采表见，虽未能比美东京，然亦一代之彦，各成体格，不可便谓无人也。……赞曰：“道学既盛，无取文史。下笔成章，非关穷理。丽淫雕蔚，各有殊致。墨翰所贵，以光君子。”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四《勿斋集》提要：宋末启割之文多喜配合经史成语，凑泊生硬。又喜参文句，往往冗长萎弱，唐以前旧格荡然。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二三：南宋之诗，犹有可取。文至南宋，则尖新浅露，无一足观者矣。

姚椿《南宋文范序》：或曰：“南宋文气冗弱，上不能望汉、唐、北宋，而下亦无以过元、明。夫道德之言不专主乎文，而亦未始不有其文，故自韩、欧以来，一则曰文者贯道之器，一则曰文与道俱，此虽其才不逮前人，犹将过而存之，以为学者劝，而况其人与文光明俊伟若是者乎？”或又曰：“南宋亡乎道学，其弊由于文胜，兹何取其文，沾沾为此，则悖谬尤甚。夫南宋之亡，由于不用道学，当时诸人议论俱在，安有迂戾乖僻，如时俗人所讥云云者。其君人弗克用，而顾以责言者之非，此则东周亡而訾孔、孟，真邪说也。”

吴德旋《南宋文范序》：论者谓宋之南渡诸家，理胜而文不逮乎古，然或又以为理



胜者文不蕲工而自工。……南宋诸家言理一衷诸孔、孟，然而文卒不逮乎古者何也？理胜者学之为，文不逮乎古者时之为，而亦其未尝刻意求工于文之故。然则或所云文不蕲工而自工者，盖难言之。

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谈》卷下：四六文字变于后宋。南渡前只是以文叙事，不用故事堆垛，末年尚全句，前辈谓赋体也。或无制裁，塞滞不通，且冗长，使人厌观。

俞焯《诗词余话》：四六尤难作，宋末如方乐、李刘诸公，骈花俪叶，联芳媲美，至有一句累十余字者，则失其为四六之体矣。与其事异而句奇，孰若字平而句雅，去陈腐，取浑成，方可以言制作之妙。

张之翰《跋草窗诗稿》：宋渡江后，诗学日衰，求其鸣世者，不过如杨诚斋、陆放翁及刘后村而已，固士大夫倒堕科举传注之累，亦由南北分裂，元气间断，大音不全故也。

虞集《磻谷居愧稿序》：南渡以来，若陈简斋参政、放翁陆公、诚斋杨公，擅名当世。

欧阳玄《罗舜美诗序》：江西诗在宋东都时宗黄太史，号江西诗派，然不皆江西人也。南渡后，杨廷秀好为新体诗，学者亦宗之，虽杨少宗于黄，然诗亦少变。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五《云泉诗》提要：江西一派，由北宋以逮南宋，其行最久。久而弊生，于是永嘉一派以晚唐体矫之，而四灵出焉。然四灵名为晚唐，其所宗实止姚合一家，所谓“武功体”者是也。其法以新切为宗，而写景细琐，边幅太狭，遂为宋末江湖之滥觞。

《瀛奎律髓汇评》卷二五方回评：自山谷续老杜之脉，凡江西派皆得为此奇调。汪彦章与吕居仁同辈行，茶山差后，皆得传授。茶山之嗣有陆放翁，同时尤、杨、范皆能之。

刘克庄《茶山诚斋诗选序》：曾茶山赣人，杨诚斋吉人，皆中兴大家数。比之禅学，山谷初祖也，吕、曾南北二宗也；诚斋稍后出，临济德山也。初祖而下，只是言句，至棒喝出，尤经健矣，故又以二家续紫微之后。

又《后村诗话》前集卷二：近岁诗人，杂博者堆队仗，空疏者窘材料，出奇者费搜索，缚律者少变化，唯放翁记问足以贯通，力量足以驱使，才思足以发越，气魄足以凌暴，南渡而后，故当为一大宗。

严羽《沧浪诗话·诗辨》：近世赵紫芝、翁灵舒辈，独喜贾岛、姚合之诗，稍稍复就清苦之风。江湖诗人多效其体，一时自谓之唐宗，不知止入声闻辟支之果，岂盛唐诸公大乘正法眼者哉？嗟乎，正法眼之无传久矣。

方回《晓山乌衣圻南集序》：自乾、淳以来，诚斋、放翁、石湖、遂初、千岩五君子，足以蹑江西，追盛唐；过是永嘉四灵、上饶二泉、懒庵、南塘二赵为有声；及过是则唯有刘后村号本色，而不及前数公。

又《晚秋杂书三十首》一：堂堂陈去非，中兴以诗鸣。吕、曾两从橐，残月配长庚。尤、萧、范、陆、杨，复振乾、淳声。尔后顿寂寥，草虫何薨薨。永嘉有四灵，词工格乃平。上饶有二泉，旨淡骨独清。学子孰取舍，吾非私重轻。《极玄》虽有集，岂得如渊明。



李东阳《怀麓堂诗话》：杨廷秀学李义山，更觉细碎；陆务观学白乐天，更觉直率。概之唐调，皆有所未闻也。

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五：南渡诸人诗尚有可观者，如尤、杨、范、陆，时近元和；永嘉四灵，不失晚季。至陈去非宏壮，在杜陵廊庑；谢皋羽奇奥，得长吉风流，尤足称赏，以其才则远不逮王、苏、黄、陈。又：南渡诸人绝句，乃有一二风致者。缘才力非前宋大家比，故趋步唐人，间得音响。然识者读之，政自了了也。

又杂编卷五：杨廷秀云：“自隆兴以来，诗名世者：林谦之、范至能、陆务观、尤延之、萧东夫。近时后进有张镃、赵蕃、刘翰、黄景说、徐似道、项安世、巩丰、姜夔、徐贺、汪经、方夔”。右杨氏所叙南渡诗人，后唯列尤、杨、范、陆为四大家。萧东夫似不称，林谦之绝无传。今四家诗存，觉延之亦非三君敌也。余子赵昌父、黄景说差著，他率卑卑。然南渡作者，殊不止此，今博考于下方（已见显达中者不备录）：陈去非、胡邦衡、李泰发、朱少章、乔年、逢年、仲晦、王民瞻、刘彦冲、欧阳铢、康伯可、刘改之、姜特立、周尹潜、姜光彦、游伯庄、张孝祥、马庄父、韩元吉、张泽民、戴复古、刘潜夫、王武臣、高九万、黄子厚、俞汝楫、李大方、曾景建、王从周、叶靖逸、孙季蕃、武允蹈、于去非、徐思叔、危逢吉、甄龙友、杜小山、路德章、敖陶孙、萧彦毓、游寒岩、严坦叔、黄孔旻、方巨山、周公谨、伯弼、方万里、胡元任、严羽卿、刘会孟、谢皋羽、永嘉四灵、杜氏五高。大抵南宋古体当推朱元晦，近体无出陈去非。此外略有三等：尤、杨四子，元和体也；徐、赵四灵，大中体也；刘、戴诸人，自为晚宋。而谢翱七言古，时有可采焉。

长谷真逸《农田余话》：宋南渡后，文体破碎，诗体卑弱，唯范石湖、陆放翁为平正，至晦庵诸子，始欲一变时习，模仿古作，故有“神头鬼面”之论。时人渐染既久，莫之或改。及文天祥留意杜诗，所作顿去当时之凡陋。

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南渡以后，陆务观颇近苏氏而粗，杨万里、刘改之俱弗如也。

朱彝尊《康熙重镌裘司直诗序》：宋自汴京南渡，学诗者多以黄鲁直为师，吕居仁集二十五人之作，目曰江西诗派。考其官阀门世，不尽学诗鲁直之门，亦不尽江西人也。杨廷秀于诗推尤、萧、范、陆，豫章居其一焉。继萧东夫起者，姜尧章其尤也，余子多见于《江湖集》。盖终宋之世，诗集流传于今，唯江西最盛云。

李坚《书正德胡刊本沧浪先生吟卷后》：夫文章与时高下，宋自北鼎南迁，国势不竞甚矣。迨于乾、淳之间，积久道洽，日趋强盛，时尤、杨、范、陆诸君子，家筑骚坛，人标赤帜，鸣盛之作，赅赅乎几还东京之旧。开禧而后，境土日蹙，故口日滋，于是声诗之变，亦与时俱。类扬沙走石以为奇，叫骂叱咤以为豪，而宇宙间几无诗矣。

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二六：建炎以后，东夫之瘦硬，诚斋之生涩，放翁之轻圆，石湖之精致，四壁并开。后永嘉徐、赵诸公，以清虚便利之调行之，见赏于水心，则四灵派也，而宋诗又一变。

叶燮《原诗》卷四：诗文集务多者必不佳，古人不朽可传之作，正不在多。……宋人富于诗者，莫过于杨万里、周必大，此两人作，几无一首一句可采。陆游集佳处固多，而率意无味者更倍。由此以观，亦安用多也。



叶矫然《龙性堂诗话》续集：南宋人诗，放翁、诚斋、后村三家相当，皆以野逸胜而精彩烨然，放翁尤妙。

田同之《西圃诗说》：宋诗中黄鲁直不免于生强，陆务观不免于滑易，范致能之缚且弱，杨万里、郑德源之鄙且俚，刘潜夫、方巨山之意无余而言太尽，此皆不成乎鹘者也。尤而效之，是何异越人之学远射，参天而发，适在五步之内也。

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下：苏、李数篇，老杜奉为吾师。不朽之作，不必务多也。杨诚斋积至二万余，周益公如之。以多为贵，无如此二公者，然排沙简金，几于无金可简，亦安用多为哉。

朱庭珍《筱园诗话》卷四：南宋四大家，当时称尤、萧、范、陆，谓尤延之、萧东夫、范石湖、陆放翁也。然三人皆非放翁匹，而延之尤卑。后萧之诗失传，乃以杨诚斋代之，改为尤、杨、范、陆，而萧之姓氏与诗，几泯灭无闻。身后名之显晦，亦有幸有不幸焉。然诚斋诗浅俗鄙滑，颓唐粗硬，纯堕恶趣，真江西派中魔魁，竟负虚名，浪传至今，殊不可解。东夫诗虽亦染江西派习气，而风骨棱棱，较诚斋为雅音矣。仅传其咏梅花句云：“百千年藓著枯树，一两点花供老枝。”又云：“湘妃危立冻蛟背，海月冷挂珊瑚枝。”又云：“悬崖雪堕惊孤鹤，压屋云凉眠定僧。”笔意崎嶇，力求生造，在拗体中，亦斩新耳目之句。

又：南宋人诗，如杨诚斋、尤延之、戴石屏、刘后村、曾茶山、周益公辈，皆浪得虚名，粗鄙浅率，自堕恶道，披沙拣金，百不获一，尚不若九僧、四灵辈，虽规模狭小，力量浅薄，而秀削不俗，犹多佳句也。诗道至此，诚为大阂。

陈衍《石遗室诗话》卷一六：宋诗人工于七言绝句，而能不袭用唐人旧调者，以放翁、诚斋、后村为最。大略浅意深一层说，直意曲一层说，正意反一层侧一层说。

张其锦《梅边吹笛谱序》：填词之道，取法乎南宋。然其中亦有两派焉：一派为白石，以清空为主，高、史辅之。前则有梦窗、竹山、西麓、虚斋、蒲江，后则有玉田、圣与、公谨、商隐诸人，扫除野狐，独标正谛，犹禅之南宗也。一派为稼轩，以豪迈为主，继之者，龙洲、放翁、后村，犹禅之北宗也。

又：稼轩为盛唐之太白，后村、龙洲亦在微之、乐天之间。

俞彦《爱园词话》：唐诗三变愈下，宋词殊不然。欧、苏、秦、黄，足当高、岑、王、李。南渡以后，矫矫陡健，即不得称中宋、晚宋也。唯辛稼轩自度梁肉不胜前哲，特出奇险为珍错供，与刘后村辈俱曹洞旁出。学者正可钦佩，不必反唇并捧心也。

刘克庄《刘叔安感秋八词跋》：长短句昉于唐，盛于本朝。余尝评之，耆卿有教坊丁大使意态，美成颇偷古句，温、李诸人困于捃拏。近岁放翁、稼轩一扫纤艳，不事斧凿，高则高矣，但时时掉书袋，要是一癖。

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北宋词多就景叙情，故珠圆玉润，四照玲珑。至稼轩、白石，一变而为即事叙景，使深者反浅，曲者反直。吾十年来服膺白石，而以稼轩为外道，由今思之，可谓瞽人扪籥也。稼轩郁勃，故情深；白石放旷，故情浅。稼轩纵横，故才大；白石局促，故才小。唯《暗香》、《疏影》二词，寄意题外，包蕴无穷，可与稼轩伯仲。

王国维《人间词话》：南宋词人，白石有格而无情，剑南有气而乏韵。其堪与北宋



人颀颀者,唯一幼安耳。

汪森《词综序》:鄱阳姜夔出,句琢字炼,归于醇雅。于是史达祖、高观国羽翼之。张辑、吴文英师之于前,赵以夫、蒋捷、周密、陈允衡、王沂孙、张炎、张翥效之于后。譬之于乐,舞筭至于九变,而词之能事毕矣。

王士禛《花草蒙拾》:宋南渡后,梅溪、白石、竹屋、梦窗诸子,极妍尽态,反有秦、李未到者。虽神韵天然处或减,要自令人有观止之叹。正如唐绝句,至晚唐刘宾客、杜京兆,妙处反进青莲、龙标一尘。

余集《绝妙好词续钞序》:词至南宋而工,词律亦至南宋而密,此《绝妙词》之所以独传也。

邹祗谟《远志斋词衷》:长调唯南宋诸家,才情蹀躞,尽态极妍。阮亭尝云:词至姜、吴、蒋、史,有秦、李所未到者。

又引朱承爵《存余堂诗话》:梅溪、白石、竹山、梦窗诸家,丽情密藻,尽态极妍。要其瑰琢处,无不有蛇灰蚓线之妙,则所云一气流贯也。

冯金伯《词苑萃编》卷二引吴尺凫云:夫词,南唐为最艳,至宋而华实异趣。大抵皆格于倚声,有叠有拍有换,不失铢黍,非不咀宫嚼商,而才气终为法缚。临安以降,词不必尽歌,明庭净几,陶咏性灵,其或指称时事,博征典故,不竟其才不止。且其间名辈斐出,敛其精神,镂心雕肝,切切讲求于字句之间。其思冷然,其色荧然,其音铮然,其态亭亭然,至是而极其工,亦极其变。

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卷六:词至南宋而极工,然如白石、梦窗、草窗、玉田,皆胥疏江湖,故语多婉笃,去北宋疏越之音远矣。

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卷一二:词家讲琢句,不讲养气,养气至南宋善矣。白石和永,稼轩豪雅。然稼轩易见,而白石难知。史之于姜,有其和而无其永。刘之于辛,有其豪而无其雅。至后来之善学姜、辛者,非懈则粗。

蒋敦复《芬陀利室词话》卷三:词源于诗,既小小咏物,亦贵得风人比兴之旨。唐、五代、北宋人词,不甚咏物,南渡诸公有之,皆有寄托。白石、石湖咏梅,暗指南北议和事。及碧山、草窗、玉潜、仁近诸遗民,《乐府补遗》中龙涎香、白莲、莼、蟹、蝉诸咏,皆寓其家国无穷之感,非区区赋物而已。知乎此,则《齐天乐》咏蝉、《摸鱼儿》咏莼,皆可不续貂。即间有咏物,未有所寄托而可成名作者。

刘熙载《艺概》卷四:南宋词近耆卿者多,近少游者少,少游疏而耆卿密也。

张预《山中白云词跋》:西湖故多沈忧善歌之士,自南渡之际,故家遗老,怆怀禾黍,山残水剩之感,风偃月偃之思,流连纤郁,忍俊不禁,往往托兴声律,借抒襟抱。其尤工者,比物偏华,言促意长,后之人推尚其作,至比于草堂诗史,谓兴亡之迹,于是乎戏焉。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二:南宋词家,白石、碧山纯乎纯者也,梅溪、梦窗、玉田辈,大纯而小疵,能雅不能虚,能清不能厚也。

沈祥龙《论词随笔》:以词为小技,此非深知词者。词至南宋,如稼轩、同甫之慷慨悲凉,碧山、玉田之微婉顿挫,皆伤时感事,上与风骚同旨,可薄为小技乎。若徒作侧艳之体,淫哇之音,则谓之小也亦宜。



《金史》卷一二五《文艺传序》：金初未有文字。世祖以来渐立条教。太祖既兴，得辽旧人用之，使介往复，其言已文。太宗继统，乃行选举之法，及伐宋，取汴经籍图，宋士多归之。熙宗款谒先圣，北面如弟子礼。世宗、章宗之世，儒风丕变，庠序日盛，士繇科第位至宰辅者接踵。当时儒者虽无专门名家之学，然而朝廷典策、邻国书命，粲然有可观者矣。金用武得国，无以异于辽，而一代制作能自树立唐、宋之间，有非辽世所及，以文而不以武也。

刘祁《归潜志》卷八：金朝取士以词赋为重，士人往往不暇读书为他文。尝闻先进故老见子弟辈读苏、黄诗辄怒斥，故学者止工于律赋，问之他文，则懵然不知。间有登第后始读书为文者，诸名士是也。南渡以来，士人多为古学，以著文作诗相高，然旧日专为科举之学者疾之为仇讎，若分为两途，互相诋讥。其作诗文者目举子为科举之学，为科举之学者指文士为任子弟，笑其不工科举。殊不知国家敕设科举，用四篇文字，本取全才。盖赋以择制诰之才，诗以取风雅之旨，策以究经济之业，论以考识鉴之方。四者俱工，其人才为何如也？而学者不知，狃于习俗，止力为律赋，至于诗、策、论俱不留心，其弊基于为有司者止考赋而不究诗、策、论也。……南渡后，赵、杨诸公为有司，方于策论中取人，故士风稍变，颇加意策论。又于诗赋中亦辨别读书人才，以是文风稍振，然亦谤议纷纭然，每贡举非数公为有司，则又如旧矣。

徐世隆《元遗山集序》：窃尝评金百年以来，得文派之正而主盟一时者，大定、明昌则承旨党公，贞祐、正大则礼部赵公，北渡则遗山一人而已。自中州斲丧，文气奄奄几绝，起衰救坏，时望在遗山。

张金吾《金文最序》：唯金崛起东方，奄有中原，幅员则广于辽，国势则强于宋，风会所开，一洗卑陋浮靡之习。聿稽武元开国，得辽旧人，文烈继统，收宋图籍，文教由是兴焉。大定、明昌间，投戈息马，治化休明。南渡以后，赵、杨诸公迭主文盟，文风蒸蒸日上。迨乎北渡，元遗山以宏衍博大之才，郁然为一代宗匠，执文坛牛耳几三十年。呜呼，盛矣！盖尝综而论之。以为大定中君臣上下以淳德相尚，士大夫之学少华而多实；明昌以后，朝野无事，侈靡成风，士大夫之学多华而少实者，杨奂之说也。以为大定以还，文治既洽，教育亦至，一扫五代、辽季衰陋之俗者，元好问之说也。以为南渡后文风一变，多学奇古者，刘祁之说也。以蔡正甫为斯文正传之宗，党竹溪次之，闲闲公又次之者，萧贡之说也。以为金百年来得文派之正而主盟一时者，皇统宇文公，大定、明昌无可蔡公、承旨党公，贞祐、正大礼部赵公，北渡后则遗山先生者，赵秉文、徐世隆之说也。……金有天下之半，五岳居其四，四渎有其三，川岳炳灵，文学之士后先相望。唯时士大夫禀雄深浑厚之气，习峻厉严肃之俗，风教固殊，气象亦异，故发为文章，类皆华实相扶，骨力遒上。虽竹溪专学庐陵，飞伯力追子厚，希颜上拟昌黎，各自名家，不拘一格，然其大较可知矣。后之人读其遗文，考其体裁，而知北地之坚强绝胜江南之柔弱。

元好问《麻杜张诸人诗评》：麻信之、杜仲梁、张仲经，正大中同隐内乡山中，以作诗为业。人谓东南之美尽是在是矣。予尝窃评之：仲梁诗如偏将军将突骑，利在速战，屈于迟久，故不大胜则大败。仲经守有余而攻战不足，故胜负略相当。信之如六国合纵，利在同盟，而蔽于不相统一，有连鸡不俱栖之势，虽人自为战而号令无适从，故